

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

刘进宝

中华书局

序 言

罗时进

在唐代诗人中,李商隐有着特别耀眼的光熹。他一生襟抱未开,而当非凡的才华熔铸进艰难抑郁的人生后,义山诗有了高情远意和沉郁顿挫,有了绮丽缠绵和包蕴密致,也有了楚雨含情、云台怅望、玉烟珠泪、锦瑟无端的讽喻寄托。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一个情韵独特的身影,给中华诗学宝库提供了一份无可替代的遗产。其“分得浣花香一瓣,汉碑元气塞乾坤”(谢启昆《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大为后代赞赏,而“獭祭曾惊博奥殫,一篇锦瑟解人难”(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也终能获得“琢磨原自有工夫”(李必恒《书樊南诗集后》)的理解。

唐代众多的著名诗人中,能够开宗立派的终究有几人呢?问到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开宗立派”的标准的争议,但无论以什么标准,李商隐之成为西昆派的效仿对象,无疑是唐代不多的具有某种特定诗体“祖师”资格的代表性作家。这显示出李商隐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也显示出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巨大影响。我在涉猎唐代文学的过程中,曾对晚唐几位名家关注稍多一些。无论学术史上人们怎样看待晚唐,我总感到李商隐、杜牧、许浑、温庭筠四家都有某种雄视三唐的内蕴力量,他们在唐代诗史发展的最后阶段中以有力的攀登建立了新的标志,为唐代诗坛增添了许多光彩。就李商隐来说,在四家中更居首位。这不仅由于他大力拓展了唐代诗境,提高了唐代诗艺,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独特的诗风。在唐代诗坛乃至中国诗史上,义山诗都非常独特。

长期以来李商隐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在唐诗研究中,当晚唐诗人尚没有充分进入学术界视野的时候,李商隐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可观

的成果；而当古今打通研究文学史尚未形成重要理念的时候，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乃至作家已经着手李商隐研究，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古往今来真不知有多少学人被李商隐诗歌世界所吸引，而每一代学人的研究又为后人留下新的话题，并逐渐累积为具有再探讨价值的课题。这种学术投入的累积使得李商隐研究至今仍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最能聚集人气、最具有发展活力的领域之一，也是最能够产生优秀成果的诗学天地。现在米彦青君的《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作为李商隐研究的一份重要成果即将出版了，这是我所期盼的，也是十分欣悦的。

一个学者选择某个作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除了受作家及其作品的魅力吸引外，也往往有自己性情和学问根底的因素。米彦青研究李商隐是否有这方面的原因呢？这使我想起不久前，我的一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在读博士生江岚打来越洋电话，谈她毕业论文《唐代文学在美国近现代的传播和接受》撰写的准备情况。我问她根据目前她掌握的资料，唐代哪些作家在美国影响较大？她回答说：大体上是李白、杜甫、李商隐和寒山。李商隐诗包孕绵密，内涵意蕴深致难求，为什么会在大洋彼岸产生影响？她告诉我那里的知识界倒是认为李商隐诗不仅具有东方古典诗歌的精纯之美，同时也有某种现代色彩，甚至还有一定的象征意味，故而比较喜欢。江岚的这一介绍使我不禁联想起米彦青选题的过程和确定题目的情景，我便更理解她为何对李商隐有那么深刻的同情和理解，在这篇毕业论文写作中又为何那样投入和痴迷。

米彦青大学是学外语的，对外国文学颇感兴趣，硕士研究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而对现代文学又不止于旁涉博览。这样的知识背景使她对古典诗学和古典诗性都有一种特别的审视和解读，我不能说那就是带有“现代色彩”和“象征意味”的解释，但确实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几年前她将第一篇课程论文《试论李商隐与张爱玲创作的共通性》交来，我认真读过后，从初闻题目的讶异变为积极推荐其发表，正是感到作者是一位感悟能力很强，能够对李商隐这个特殊诗人作出个性化阐释的学者，在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队伍中，她将是一位具有新的研究风格的学者。

这本《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是米彦青学术生涯中撰写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整个写作过程是她对自己的一次很好的证明。不仅是她好学深思、感悟敏达的证明，也见证了她的甘于寂寞、坚毅刻苦。我

还记得在开题后已经写出一部分内容时,学界前辈、著名李商隐研究专家刘学锴先生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出版了,当时她感到有空前的压力。论文要写出新意,要提出创见,就必须对原有的构想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最后反复考虑确定了以清代诗人接受李商隐的个案研究为重点,特别加强义山诗在晚近诗人中的接受情况和研究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这增加了论文的写作难度,特别是搜集文献资料的工作量很大,挑战意味是明显的。以后的过程表明,她脚踏实地去做文献基础工作,是肯下“硬功夫”的,即使是三九寒天独自一人借案于北图也以苦为乐,三易文稿从不厌其烦。虽然当时这一切都视为硬性要求,不容回避,但作为导师其实内心非常赞赏,也颇为感动。现在论文能够顺利出版,也应了“天道酬勤”的古训。

博士毕业后,米彦青进入了内蒙古大学,回到了母校。内蒙古,一片多么广袤的绿色土地,我相信那里将是她学术发展的高天阔地。本书的出版自然是一份鼓励,同时也应是再跋涉前进的起点。希望她心有灵犀而志存高远,沿着“桐花万里丹山路”走出学术和人生更好的风景!

2006年11月25日序于吴门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时代之音:清初虞山诗派对李商隐的接受	36
第一节 独倚银轮哭桂花 ——异代同调的钱谦益与李商隐	36
第二节 带露和烟又一春 ——二冯对李商隐的接受	54
第三节 忍将衰泪滴江湖 ——虞山诗派的义山追步者及其影响	64
第四节 何处高楼最有情 ——朱鹤龄对李商隐的接受	69
第五节 楚天云雨尽堪疑 ——吴乔对李商隐的接受	75
第二章 心灵之路:娄东诗派对李商隐的接受	80
第一节 锦江新酿玉壶冰 ——从靳荣藩《吴诗集览》看吴梅村对义山诗的承袭	80
第二节 玉树歌残恨未休 ——心灵关照中的吴梅村对义山诗的接受	94
第三节 授简肯忘群彦会 ——娄东十子的创作与义山诗风	105
第三章 悠扬归梦:黄任和康雍诗坛对李商隐的接受	111
第一节 后身还去作浮萍 ——黄任对李商隐的接受	111

第二节	怅望江头江水声	
	——康熙、雍正时期诗坛对李商隐的评介	120
第三节	过水穿楼触处明	
	——清代前期李商隐研究专著述略	129
第四章	盛世繁响:黄仲则及乾嘉诗坛对李商隐的接受	132
第一节	似此星辰非昨夜	
	——黄仲则对李商隐的接受	132
第二节	新声温李莫轻谈	
	——屈复、程梦星、姜炳璋诸人对李商隐的接受	139
第三节	更入新愁却不禁	
	——冯浩、纪昀对李商隐的接受	144
第四节	歌杂渔樵断更闻	
	——乾嘉诗坛诗话中的李商隐接受	151
第五章	家族传承:桐城派、曾氏家族及 李希圣对李商隐的接受	158
第一节	锦帆暮雨回江渚	
	——桐城派和曾国藩对李商隐的接受	158
第二节	相见时多别亦多	
	——曾纪泽对李商隐的接受	163
第三节	玉龙灰烬难成烛	
	——曾广钧及西昆派李希圣对李商隐的接受	169
第六章	西昆回归:吴下西昆派对李商隐的 接受和变幻中的晚清诗坛	181
第一节	铜驼见处应荆棘	
	——吴县曹元忠、汪荣宝对李商隐的接受	181
第二节	空中着色元如梦	
	——常熟徐兆玮、张鸿、孙景贤对李商隐的接受	195
第三节	略工感慨是名家	
	——龚自珍、姚燮和姚莹对李商隐的看法 与刘熙载等人的义山诗论	208
第四节	李商隐文的整理和钱氏的《樊南文集补编》	214

第七章 刻意伤春:樊增祥、易顺鼎对 李商隐的接受和末世诗论	217
第一节 缥缈仙心绕碧城 ——樊增祥对李商隐的接受	217
第二节 九龙呵护玉莲房 ——易顺鼎对李商隐的接受	224
第三节 望帝心伤锦瑟诗 ——张之洞、张佩纶和王闾运、 同光派诸人对李商隐的接受	230
第八章 蓦然回首:清代女诗人对李商隐的隐性接受	238
第一节 梦里流年情未已 ——女诗人对李商隐诗歌 意境、体式和内容的接受	238
第二节 终见灵衣拂月坛 ——论个体女诗人对李商隐的接受	251
结 论	261
参考文献	267
后 记	280

引言

一

随着文学史写作中接受美学理论的引进,运用自觉的文学接受史意识来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正日益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接受美学如现象学的美学一样,认为美和文学艺术是文化的构成要素,要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背景,而文化就体现在当代人的意识中。”^①当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在阅读经典的同时,通过点评、论述和模仿经典诗作等方式,把自己对作品的感悟记载流传下来,这些材料经过后人发掘、整理和归纳,就会形成诗歌长河中的某个作家的接受史。“艺术史只要能够找出并描述出作品的标准和语境,复活过去艺术中保留下来的人类经验的巨大财富,使过去的艺术能够为现今时代所感知,那么艺术史就会重新赢得其存在的合理性。”^②同样的,在经过了这样的重新审视与阅读,经典也因之而获得它们自身的生命与自足性,超越历史的命运。

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文学接受理论在努力提高读者地位的同时,文学研究与此相适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文心雕龙研究史》《诗经研究史》等的撰写不但显示出了学者对接受史研究中的文学规律和文学理论的把握能力,而且也可以看出接受史的研究的确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学术领域。为接受美学奠定哲学基础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任何存在都不能

① 【德国】H. R. 姚斯、【美国】R. C. 霍拉普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李泽厚主编《美学译文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9。

② 同上,页95。

超越一定历史环境,都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定在”。存在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规定了人的认识和理解的历史具体性——我们认识、理解任何事物,都是以自己已有的先在、先见、先把握,即意识的“先结构”为基础,进行有选择、有变形地吸收^①。“作品呈现在读者心目中的实际意义,并不是作者给定的原意,而总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历史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②清代词学家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里曾说:“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叶嘉莹认为:“他所讲的,其实就是 Reader's Response,就是 Aesthetic Reception,即读者的反应和接受的美学。”^③在不同时代社会背景下的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就会有不同的期待,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这种不同本身就可以见出读者对作品相似或相异的接受,而读者的这种接受也常常会对诗史上作家作品的接受产生强大的影响。

接受史研究属于批评学,它要求在系统的史料整理的基础上,从审美的、理论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作进一步的思考,以求对文本意义获得更深的理解,然后在深入理解的情况下通过对个体诗人在诗史上的接受状况进行研究,从而对诗歌创作、诗学原理和接受规律诸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在当下的接受史的研究中,诗歌和诗人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高中甫《歌德接受史》、刘敏《海涅抒情诗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杨文雄《李白接受史研究》、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和刘学锴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都是秉承了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的理论模式,从对个体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入手,把对古典作家的接受研究与现代的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很好地结合,从而研究出植根于中国本土、对外来文化又有借鉴的具有中国本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著作。在这些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著述中,刘学锴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更是因其占有了对诗史上众多典籍系统梳理后的优势,在接受史研究领域压倒群芳。

① 【德国】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189—197。

② 【德国】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280。

③ 叶嘉莹:《读中国诗词文本中的多义与潜能》,《南开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二

“历史时期极少以具体日期开始或终结。”^①李商隐作品的接受具体始于何时,现在无从查考,但在晚唐就已经开始萌动是无疑的。李商隐曾在其《朱槿花二首》中明确说:“君问伤春句,千辞不可删。”可见其同时代人已经有人建议他删掉渗透伤感意绪的伤春之句了。“千辞”在这里不惟是李商隐对自己诗歌风格的珍视之体现,同时也说明这一时期读者的反响之强烈。“选择即评价”。尧斯说:“一种过去文学的复归,仅仅取决于新的接受是否恢复其现实性,取决于一种变化了的审美态度是否愿意转回去对过去作品再予欣赏,或者文学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出乎意料地把一束光投到被遗忘的文学上,使人们从过去没有留心的文学中找到某些东西。”^②美、艺术之类的文化现象,更多地是与人们的感性、情感生活密切相连的,从而也就要求研究者更多地从主体出发,在对文化做出深描的基础上,以设身处地的姿态、同样的审美体验进入艺术的空间,从而才可能对艺术作品做出富有体验性的共鸣理解。这样,才能真正领会到艺术与美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所具有的精彩韵味,也才能理解它们是如何形象生动地展现于特定群体的生活中。故此在诗史的流变过程中看李商隐的接受缘何兴起,因何衰落对于李商隐接受史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李商隐在诗史上的接受过程,本书拟分为清之前、清代和清后期至今三个部分来综述。

(一)晚唐五代、宋、元、明的李商隐接受

晚唐以后的诗人、词人受到李商隐影响的颇多,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理论研究方面,李商隐均成为历代诗坛所关注的“焦点”,成为一个历久不衰的文化命题。无论是阐释史上的诗评接受,还是影响史上的作家接受,抑或效果史上的大众接受,在这一时期都有表现,为了行文便利,对于晚唐五代至清之前七百多年诗史中对李商隐的接受,本书试图融合阐释史、效果史和影响史,从“人品”“诗品”“诗艺”“选本”“拟

① 【美国】庞百腾著,陈俱译:《沈葆楨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德国】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页 44。

作”五个部分来做论述。

——人品

对于李商隐人品的论述,最初始于唐末五代的《旧唐书·文苑传》记载令狐绹“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还说他与段成式、温庭筠“俱无特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这一史载对后世的李商隐接受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延及北宋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的史观。除了两唐书之外,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中对李商隐人品亦曾大加诋诃,其卷十一针对李商隐《九日》诗评其人品曰:“盖令狐楚与商隐素厚,楚卒,子绹位至通显,略不收顾,故商隐怨而有作。然实商隐自取之也。且商隐妻父王茂元与所依郑亚皆李德裕党也。商隐与二人昵甚,故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绹恶其异己也。后绹当国,商隐亦归穷自解,绹虽与一太学博士,然商隐亦厚颜矣。唐之朋党,延及播绅四十年,而二李为之首,至绹而滋炽。绹之忘商隐,是不能念亲;商隐之望绹,是不能揆己也。”并论及义山《柳枝五首》是“天伦同气之重,共聚于子女揉杂之所”,杜撰了义山欲昵柳枝而未遂的故事。这说明在程朱理学兴盛的宋代,像葛立方这样的道学家,认为带有唯情倾向的李商隐诗作是很不符合道学原则的。不过同时期的黄彻却认为李商隐有刚直不阿的一面,其《碧溪诗话》云:“李义山任弘农尉,尝投诗谒告云:‘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虽为乐春罪人,然用事出人意表,尤有余味。英俊陆沉,强颜低意,趋跄诺虎,扼腕不平之气,有甚于伤足者。非粗知直己,不甘心于病畦下舐,不能赏此语之工也。”但是宋代对李商隐人品的主流评价是持贬抑态度的,这种偏见沿袭下来,至元代辛文房编《唐才子传》时,对李商隐的评论基本还是袭用两《唐书》之说。

——诗品

唐末五代李涪《刊误·释怪》认为李商隐是一名“锦工”,其作“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对于李商隐诗品的看法受到时人所论的“绮艳”之语的影响。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唐李义山,乃邪思之尤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义山诗的看法是“浅近”,含有浅薄之意。范晞文《对床夜话》又指责李诗违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不过

洪迈的《容斋诗话》却看出义山咏史诗有直笔^①。元代郝经《与撒彦举论诗书》认为包括李商隐在内的部分中晚唐诗尽为“辞胜之作”，李商隐、温庭筠、许浑的诗作更是“病风丧心”，毫无性情风雅之作。从这些论述可以发现，李商隐的诗品在明以前虽然论者颇多，但基本上是持贬抑的态度。这种负面接受，显然是受到对李商隐人品的看法影响所致。

——诗艺

李商隐作为诗史上深有影响，而又有自己独特诗歌风格的诗人，其艺术特色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是长久而富有生发感动之力量的。诗评家对此的认识亦是渐趋全面的过程，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侧面发现出来的，所以在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因而本书对此的论述比重较大。

晚唐陆龟蒙认为，李商隐属于“抉摘刻削露其情状”的苦吟一派。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说李商隐文章“宏博”。北宋前期杨亿曾对李商隐诗作了全面而极高的评价，因为杨亿是“西昆派”的领军人物，而“西昆派”与李商隐体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此杨亿的评述在李商隐接受史上有重要意义，其自序出于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玉溪生”条，取自《杨文公谈苑》，云：

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观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久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态之变，精索推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斑，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由是孜孜求访，凡得五、七言长短韵歌行杂言共五百八十二首。唐末，浙右多得其本。故钱邓帅若水尝留意捃拾，才得四百余首。钱君举《贾谊》两句云：“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钱云：“其措意如此，后人何以企及！”余闻其所云，遂

① 洪迈《容斋诗话》卷一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直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辞》，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驿》《骊山》《龙池》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说明李商隐咏史诗中直辞咏寄的精神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除了洪迈，杨万里还注意到了义山在这类诗中托意微讽的精神，如杨万里《诚斋诗话》曾赞扬义山：“微婉显晦，尽而不污。”

爱其诗弥笃，乃专辑缀。鹿门先生唐彦谦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盖圣人之一体也。然警之之句亦多，予数年类集。后求得薛廷珪所作序，凡得百八十二首。世俗见予爱慕二君诗什，夸传于书林文苑，浅拙之徒，相非者甚众。噫！大声不入于里耳，岂足论哉！

杨亿的这段话不但谈到对义山诗的搜集以及钱若水和唐彦谦对李商隐的评论，而且着重谈了他总结的义山诗艺的六个方面：一是富有才华，擅写艳情；二是风格雅丽；三是诗作构思细密，内蕴多层；四是表现平易畅达；五是诗味无穷，经得起咀嚼；六是善于刻画变化多姿的事物，表达难以言传的精神。这是李商隐诗流传至宋所得到的最为全面也是最高的评价，而杨亿等人在搜集义山诗作、分析模仿义山诗的基础上创作结集而成的《西昆酬唱集》，不但成为宋初的一个很大的诗歌派别，而且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李商隐诗被宋人接受，故此这是在李商隐接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论述。此后王安石首次在诗史上提出李商隐学诗中对杜甫的承传和发展之关系，认为李商隐“学老杜而得其藩篱”^①。刘攽《中山诗话》论及义山诗的名篇《锦瑟》，曰“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开义山《锦瑟》千余年来阐释时索隐本事之先河。许 的《彦周诗话》又看出了李商隐和黄庭坚诗风在精深锻炼之处的相通性^②。范温《潜溪诗眼》是诗论家

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蔡宽夫诗话》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唯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类，虽老杜无以过也。”这里王安石所标举赏爱的李商隐的四联诗分别出自《杜工部蜀中离席》《安定城楼》《戏赠张书记》《夜饮》，均是李商隐的优秀作品。而且都是忧时伤世之作，可见作为政治家的王荆公，对李商隐的接受与其在《杜甫画像》中对杜甫的评赞，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义山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忧念时事、系心国运。王安石是李商隐接受史上第一位注意到李商隐和杜甫之间承传关系的评论家。

② 许 《彦周诗话》：“李义山，字字锻炼，用事婉约，仍多近体。”又云：“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出，大可恶。客问何以去之，仆曰：‘熟读唐李义山诗与本朝黄鲁直诗而深思焉，可去之。’”是李商隐接受史上最早看出在李商隐和黄庭坚表面上相去甚远的诗风中有精深锻炼共通性的诗论。

中最早提到李义山诗有“高情远意”特点的^①。而吴炯《五总志》所载的“唐李商隐为文，检阅书史，鳞次堆积左右，时谓獭祭鱼”，为后世留下义山诗爱堆垛的口实。惠洪《冷斋夜话》“西昆体”条云：“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

南宋对李商隐的诗歌艺术特色也有很多发现，范元实在《诗眼》中特别推崇义山，曾具体分析了他的《马嵬》《筹笔驿》二诗，最后还指出李商隐诗境的深远不凡：“义山诗，世人但称其巧丽，与温庭筠齐名，盖俗学但见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识也。”周紫芝谓李义山诗“诡谲怪奇”^②，敖陶孙又认为义山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适用”，这些都是诗史上对李商隐的重要评说。对义山分体式诗歌的论说此期也开始出现，杨万里、吕本中、黄彻、吴聿、严有翼、罗大经均对义山七绝诗艺有评，而且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还提到李商隐好反其意用典体现“识学素高”。黄彻也从义山爱堆积故实中得出“凡作者，

① 范温《潜溪诗眼》云：“文章贵众中杰出，如同赋一事，工拙尤易见。余行蜀道，过筹笔驿，如石曼卿诗云：‘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脍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处便可用，不必筹笔驿也。殷潜之与小杜诗甚健丽，亦无高意。惟义山云：‘鱼鸟尤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也。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谊贯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凜然复见孔明风烈。至于‘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属对亲切，又自有议论，他人亦不及也。马嵬驿，唐诗尤多，如刘梦得‘绿野扶风道’一篇，人颇诵之，其浅近乃儿童所能。义山云：‘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语既亲切高雅，故不用仇怨堕泪等字，而闻者为之深悲。‘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如亲扈明皇，写出当时物色意味也。‘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益奇。义山诗世人但称其巧丽，至与温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见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识也。”范温通过不同作者同一题材诗作的对比，见出义山诗的高情远意，这一结论不惟是对义山七律的见地，同时也是对义山诗歌特点的总体性概括。

②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十《风玉亭记》云：“唐人意诗名家者甚多，独以李长吉、李义山、杜牧之为诡谲怪奇之作。牧之诗其实清丽闲放，宛转而有余韵，非若义山之僻、长吉之怪，隐晦而不可晓也。”这一论点显然受到宋祁、欧阳修对义山“诡怪”之评的影响，同时期的朱熹在其《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中认为朱弁“于诗酷嗜李义山，而词气雍容，格力闲暇，不蹈其险怪奇涩之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在夸赞朱弁的同时，其实也说出其认定的义山诗风有险怪奇涩的弊病。

须饱材料”。除此而外,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记载了义山诗中“当句对”^①这一艺术手法。但是追求艺术精深的爱国诗人陆游对李商隐诗艺有所赞赏的同时,对温李诗风却很不满意^②。严羽谓李商隐体即西昆体,后世对李商隐体和西昆体的混称即从《沧浪诗话》始。

刘克庄是南宋时期对义山诗做过深细研究,有独到体会的诗论家。其《后村诗话》共十四卷,其中有关李商隐的条目是十八条。最后一条的末尾对李商隐总评道:“温庭筠与商隐同时齐名,时号‘温李’。二人记览精博,才思横逸,其艳丽者类徐、庾,其切近者类姚、贾。义山之作尤锻炼精粹,探幽索微,不可草草看过。”刘克庄是李商隐接受史上首次揭示其诗与徐、庾之间的承传关系的诗论家。对义山诗艺的品评也甚为精到,用“锻炼精粹,探幽索微”一语总结了李商隐诗作擅长抒写幽微隐深意绪而尤在结构上工于巧思的特点。同时期的诗论家范晞文谓义山诗“编事、为事所使”,对于李商隐的好用典故有所指摘。两宋的诗评非常发达,诗论家对李商隐的接受在贬抑中见赞誉,在欣赏中又有指责,义山诗歌的艺术特色就在正、负两种评价的交织声中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接受着。

金元时期非常短暂,所以诗论相对较少,王若虚《滹南诗话》曰:“予谓用昆体工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无事乎昆体工夫,盖二者不能相兼也。”对西昆体的指摘,其实也包含了对李商

① 洪迈《容斋诗话》卷二云:“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蒸兰藉’、‘桂酒椒浆’、‘桂櫂兰枻’……李义山一诗,其题曰《当句有对》,云:‘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凤孤忆离鸾。三星三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其他诗句中,如‘青女素娥’对‘月中霜里’,‘黄叶风雨’对‘青楼管弦’,‘骨肉书题’对‘蕙兰蹊径’,‘花须柳眼’对‘紫蝶黄蜂’,‘重吟细把’对‘已落犹开’,‘急鼓疏钟’对‘休灯灭烛’,‘江鱼朔雁’对‘秦树嵩云’,‘万户千门’对‘风朝露夜’,如是者甚多。”当句对的对仗方式,在李商隐诗中大量使用,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手段,洪迈首先发现,并在自己的诗话中提出,开李商隐研究史上向纵深艺术手法研究之先河。

② 陆游一生忧愤国事,对衰乱时世士大夫的流宕放逸之风非常不满。其诗中对晚唐诗风的衰颓多有指摘,在《示子适》一诗中,他把矛头直接指向温李,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郤。”但在《假日闭户终日偶得绝句》中又说:“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却看《玉溪诗》。”在上述两种矛盾的态度中可以看出陆游作为政治家爱国者的本色和作为诗人的特性,同时也说明李商隐诗作艺术上的高超可以吸引来自不同阶层的诗人。

隐诗风的不满。李纯甫《西岩集序》云：“李义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元好问是李商隐接受史上非常重要的诗论家，其《论诗绝句三十首》有三首涉及李商隐。其三云：“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其十二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其二十八云：“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第三首中元好问表明了对“温李新声”的反感，但这并不是他对李商隐诗作的整体看法，事实上，他所反对的仅是内容偏于柔靡的绮艳之作，从第十二首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用义山运用比兴手法和朦胧意境诗风写作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锦瑟》之语，来评论义山的创作，表达了他对义山诗整体特色的把握。《论诗》第二十八首主旨是批评江西后学，但其中对李商隐诗艺高度评价，谓义山诗“精纯”，“精”是指义山诗作诗艺精工，意蕴精粹；“纯”是指其是纯粹的诗人之诗，在诗作内容上也反复提炼。其后的袁桷《书汤西楼诗后》云：“玉溪生……别为一体。命意深切，用事精远，非止于浮声切响而已。”《书郑潜庵李商隐诗选》云：“李商隐诗号为中唐警丽之作，其源出于杜拾遗。晚自以不及，故别为一体。”对李商隐源出杜甫和诗中命意深切、用事精远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

明代初期和中期宗盛唐，对李商隐的总体诗艺评价比较偏颇，但间有新论。初期的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谓李商隐“专夸靡曼”，后王祯《练伯上诗序》谓李商隐诗风“流于靡曼”，高棅《唐诗品汇》谓李义山整体诗风“隐僻”，但其《唐诗品汇·七律叙目》又云：“李商隐长于咏史，……今观义山之《隋宫》《马嵬》《筹笔驿》《锦瑟》等篇，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者。”首次从整体上给义山咏史七律做出高度评价。中期张《西昆酬唱集嘉靖刊本序》在李商隐接受史上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序云：

论诗者类知宗盛唐，黜晚唐，斯二体信有辨矣。然诗道性情，古人采之，观风正乐，以在治忽者也。如不得作者之意，徒曰盛唐盛唐，予不知其真似盛唐亦何以也。杜少陵，盛唐之祖也，李义山，晚唐之冠也，体相悬绝矣，荆国乃谓唐人学杜者，唯义山得其藩篱，此可以意会矣。杨、刘诸公唱和《西昆集》，盖学义山而过者。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徂徕、冷斋，著为《怪说》、“诗

厄”，和者又从而张之，昆体遂废，其实何可废也！夫子一叹由瑟，门人不敬子路，信耳者难以言喻如此，故曰：“游于艺。”夫诚以艺游，晚唐亦可也。不然，盛唐犹是物也，奚得于彼哉！要必有为之根源者耳。子美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作者之言盖如此。夫惟达宣圣游艺之旨，审老杜技道之序，味介甫藩篱之说，而得欧公变昆之意，诗道其庶矣乎！

这篇序以王安石所说李商隐得杜甫藩篱为主线，在梳理西昆体传承李商隐体中所发生的演变及诗论，从文学的审美角度出发，发展“游于艺”的观点，对当时诗坛前后七子严格区分盛、晚唐分界、只宗盛唐的言论做出回击。其后张懋修《墨卿谈乘》云：“歌行之怪幻者，无如长吉，而义山仿佛之；但商隐好僻涩，故事多于长吉，贺好不经人道语胜于义山耳。”对义山诗中学长吉体这一现象给予重视，他之后的何良俊《四有斋丛说》谓：“齐梁体自盛唐一变之后，不复有为之者，至温、李出，始复追之。”又看出李商隐对齐梁体的接受。但稍后的胡应麟《诗薮》和许学夷《诗源辩体》，在对义山的接受中，秉承“格以代降”之说，对其诗艺多有贬抑^①。

明代后期前后七子的影响减弱，而且世人对“情”的认识有所变化，这一时期对李商隐诗艺上的接受发生很大变化。袁宏道《风林纤

① 胡应麟《诗薮》认为体以代变，格以代降，因而从整体上对包括李商隐在内的晚唐诗持贬抑态度。如他认为七律：“唐七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又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超忽纵横，又一变也。……李商隐、杜牧之填塞故实，皮日休、陆龟蒙驰骛新奇，又一变也……否道斯极，唐亦亡矣。”对于七绝，他说：“中唐绝如刘长卿、韩翃、李益、刘禹锡尚多可讽咏。晚唐则李义山、温庭筠、杜牧、许浑、郑谷。然途轨纷出，多歧亡羊，信矣！”他同时也认为“晚唐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皆宋人议论之祖。间有极工者，亦气韵萧飒，天壤开、宝。然书情则怆恻而易动人，用事则巧切而工悦俗，世希大雅，或以为过盛唐。具眼观之，不待其辞毕矣。”胡应麟整体的文学观念是建构在“格以代降”基础上的，所以虽然他也认为李商隐是七绝名家，能写出书情怆恻、用事巧切，但与盛唐相比，则有天壤之别。“气韵萧飒”不惟是他对李商隐七绝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所有体例的看法。许学夷的《诗源辩体》完全承袭了他的这一观点，不过有价值的是许学夷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看出了李商隐“七言古，声调婉媚，大半入诗余矣”（《诗源辩体》），颇有文学史家的眼光。